

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

何真榮



何家榮

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何 香 凝
(一八七九——一九七二)



后排左起第二人为廖仲恺，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何香凝，
第四人为孙中山，第五人为宋庆龄，第七人为廖梦醒。
孙中山前面的为廖承志。

2021.11

回忆孙中山先生

—

1902年的冬天，在仲恺东渡日本两个月以后，我也到日本去留学。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廖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和仲恺，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三个人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

切地接见了我们。正象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十分佩服，十分赞成。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叫我们组织留日学生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和仲恺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为他们照料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

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谈恋爱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中”（即女服务员）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才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将她留在娘家托人抚养，独自又回到日本留学。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被清政府逮捕，后来牺牲了。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

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

1905 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经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

和集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仲恺因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入盟手续。那时盟员中还没有女的，我就是第一个女盟员。入盟的手续，本来要两个人介绍。我填的入盟书，只有黎仲实一个人的签名，后来孙先生看了，他也签了个名字。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入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未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

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

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入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入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

那天孙先生和黎仲实刚好到我家里来，所以大家会面。晚饭后，休息了一下，孙先生、黎仲实和仲恺谈及同盟会的组织和主义，仲恺有志革命很早，他当然十分赞同。随即办理宣誓入盟手续，介绍人是黎仲实和我。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先生展开了辩论。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再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黎仲实有事先走了。我见夜已深沉，还特意起来替孙先生预备被褥，一并请孙先生留宿。当时孙先生详细地向胡汉民讲解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

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他们二人反复争辩到深夜三时，胡汉民才入盟。所以胡汉民后来不同意改组国民党，不同意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表，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入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于是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

这次“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的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写宣传革命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三类。其

中第一类人的文章仅仅反映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等。第二类人的文章则指出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宣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用笔名“屠富”）。当时中国同盟会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中的另一部分在改组中

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在1925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已牺牲。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入了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迟了二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我和仲恺、朱执信等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

记得孙先生有一次赴欧途中，在船上结识了在法国巴黎开古董店的华侨张静江。正象很多华侨一样，张静江也十分同情反清革命。分别之时，他与孙先生约好，

“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以随时打电报给我，不过，这些事进行要秘密，款项不用写明数目，只写 ABCD E 就可以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了。”当时，孙先生对这个表示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回来之后，有一次急需用款，就叫仲恺打电报到法国给张静江等华侨。当时还不敢存奢望，只写了一个 B 字，法国华侨就立刻汇了五万元回来，对革命事业帮助很大。对于革命，华侨不但出了不少钱，还出了力。华侨亲自回来参加革命起义的就不少。行刺清朝孚岐^①的著名的温生才烈士就是华侨。

在同盟会成立之后，我也结识了秋瑾。她是一个不事装饰的女子，为人豪爽热情。我是广东人，那个时候还不懂普通话。我和他们那些外省籍的同志都是用笔谈的。但我们同样都是青年人，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推翻清廷，建立富强繁荣的祖国的理想和志愿，我们不难找到共通的心声。语言的隔膜，并没有妨碍我们成为投契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后来在 3 月 29 日广州之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之一——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方声洞，也是在这个时候与我认识的。

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继续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

^① 孚岐——清政府广州将军。1911 年 4 月 8 日，被温生才击毙。

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就是这样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为革命做了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凡是孙先生吩咐我做的工作，凡是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我从不推辞。我觉得我既已献身革命，就应该乐于完成交给我的任何任务。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连九族的。

1910年至1911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有一些革命同志因为急于推翻清政府，采取了暗杀行动。除温生才刺孚岐之外，还有李沛基炸凤山^①。至于1910年谋炸摄政王，则主要应该归功于喻云纪和黄复生。一切部署准备的主要工作，都不是汪精卫做的。汪精卫之所以参加谋炸摄政王，也不过是在当时革命困难日增的情况下，由于失望而铤而走险的拚命行动。当时这一些行动孙先生都不赞同。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不果被囚之后，孙先生就说过：“我们革命党人做革命

① 凤山——清政府广州将军。1911年秋天，被李沛基炸死。